

华东交大:心理情景剧一票难求

心理健康教育令该校近10年无学生自杀

本报记者 李菁莹 陈婧

华东交通大学南区礼堂近日人头攒动,一年一度的“全校校园心理情景剧大赛”总决赛正在举行。今年已是第11届,总决赛前5天就出现一票难求的火爆场面了。

今年大赛的主题是“是时候……(It's time to)”。在大赛中拔得头筹的是软件学院选送的作品《快民》。“在忙碌重复的生活中,人们往往容易患上冷漠、麻木的心理病,是时候慢下来好好感受生活了!”这部头奖作品的导演、编剧,大四男生胡保生这样阐述他“创作理念”。

像胡保生一样,几乎每个华东交大的学生自入学开始,就会接触到与“心理健康教育”相关的各种活动。“在我们学校,几乎每个学生都对心理健康、心理咨询有一个较为清晰的概念,学生们对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的认同度也较高。”舒曼介绍说。舒曼,华东交通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也是学校“心理情景剧大赛”的创始人,每一届比赛,他都雷打不动当评委。

近10年来,这所高校没有发生一起学生自杀事件。记者走进华东交大,试图了解这所学校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探索。

“灭火”重要“防火”更重要

由于大学生群体的特殊性,从2004年的“马加爵案”到最近的“复旦投毒案”,每一起恶性案件出来之后,都会在社会上掀起一波关于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讨论,但是,“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严重”,舒曼说。

教育部2004年针对35所高校学生的测评结果显示,大学生群体中真正患有不同程度和类型精神障碍、心理疾病的学生只占总人数的0.32%。而根据北京心理危机干预中心有关研究人员测算,目前5%左右的中国人心理患有不同程度和类型的精神障碍、心理疾病。

“这两个数据相比,大学生群体总体心理健康状况还是优于一般社会群体的。”舒曼说。

在舒曼看来,高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除了要对少数原本就存在心理问题的学生提供及时帮助以外,更重要的是,要关注更多的心理健康大学生群体,给他们打“预防针”,让他们在遇到问题和困难时,能够正确看待和应对自己心理与情绪的变化。

“这和消防队除了灭火以外,更多的精力要放在防火上是一个道理”,舒曼说,“认为心理健康教育只需要关注心理有问题的人是最大的误解”。

在活动中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让健康者更健康,心理困惑者能得到及时帮助是华东交通大学心理健康教育的宗旨。”学校分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校领导汪立夏介绍。

“心理情景剧大赛”就是要破解“如何将心理健康教育覆盖到健康的大多数”这一难题。

舒曼介绍说,每年的“心理情景剧大赛”会持续一个多月,“在这个过程中,班级里的每一个人都要参与其中,哪怕跑个龙套、搬个道具也是一种参与,不知不觉中学生就接受了心理健康教育的理念。他们拆除了挡在学生与心理辅导间的隔阂之墙,不再认为谈心理问题是一件羞于启齿的事情。”舒曼说。

“另外,心理剧涉及的题材也非常多样,比如在学生中普遍存在的自卑、攀比、就业压力、人际交往、情感困惑、价值观迷失等心理问题都有所涉及。作为一种团体心理咨询与治疗的方式,参与者和观看者,都能从心理剧中不经意间得到心理宣泄和疏导,更会引起反思与改进。”

为了更好解决这个问题,舒曼和他的团队还开发了一种新“玩法”——开展“心理素质拓展训练”。

舒曼记得,2004年,他带着24名学生到野外举办心理素质拓展训练,“没想到效果出奇的好。一位失眠很长时间的学员,经过一天一夜的训练和劳累,睡眠质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队员之间还建立了情感支持系统,在互相的鼓励中,队员们变得越来越自信。”2009年初,华东交通大学又首次把心理素质拓展纳入新生军训体系。

在不少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仍是“抱养的孩子”

眼看着他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从他刚来时的“一个人一间房一部电话”发展到现在的“如火如荼”,舒曼感到欣慰的同时,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取得目前这些成绩,得益于学校重视心理健康教育”。

“但是较为普遍的现实情况是,除少数经济发达地区外,在很多高校里,心理健康教育仍然是抱养的孩子——零花钱少、说话没分量。”作为江西省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专业委员会的副秘书长,舒曼时常有机会与同行交流,他发现,在有的普通高校和高职院校,甚至存在“上头来检查的时候很重要,不检查时就不重要”、“出事时很重要,不出事时不重要”的普遍现象。舒曼分析这种“怪象”背后,有几个原因。

首先,在顶层设计上,主管部门对于心理健康教育的规定,存在“弹性有余、刚性不足”的问题。

2001年教育部印发的《教育部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见》中规定“高等学校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经费原则上在德育工作经费中统筹解决。”

“这种过于弹性化的表述,使得经费是否能得到落实、能落实多少等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校和学校领导的重视程度。这导致在执行上大打折扣,因此很多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依然存在经费短缺的问题。”舒曼说。

其次,“心理健康教育不是包医百病的良药”,遇到具体案例时,往往需要保卫处、校医院、学工处等各部门的联动配合,但是在现实情况中,由于心理健康教育部门“说话没分量”,往往难以形成这种“合力”。

另外,高校中心健康教育老师的素质也愈来愈成为一大问题。舒曼说,一定程度上和“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资格认证的‘准入门槛低’、‘考核不严谨’”有关。

“在江西只要花大约4000块钱,经过几个月培训和考核就可以持证上岗,整个过程的操作都缺乏严谨性。不少退休职工、下岗工人等都可轻松拿到证”。在一些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岗位由于缺乏具有

专业背景的老师,只能由思想政治老师、其他团学部门老师“顶上”。

而对高校专职从事心理健康教育的老师而言,“上升空间”有限,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心理咨询的岗位不仅要求心理健康老师每天坐班接待来访学生,还要负责组织活动、编辑宣传材料等工作。但是,心理教师的编制首先是老师,因此,即使与自己的专业相关的工作做得再多,如果没有科研成果和论文发表,在年终工作量考核与职称评聘中也是没用的。”舒曼说,这就导致很多心理老师对自身发展充满纠结和焦虑,看不到出路。

最后,对“心理健康教育”的正确观念还有待普及。

具备良好心理素质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更有竞争力

为了进一步普及心理健康教育,今年,华东交通大学又探索出一条“新路”——针对刚进校的大学新生开展“心理助跑”活动。

“这里的‘助跑’不是真正的跑步,而是将大学生涯比喻成一场长跑”,舒曼说,“我们希望在他们‘起跑’的时候就去帮助他们树立目标、摆脱刚进入陌生环境的不安与焦虑感。”

新学期伊始,华东交通大学接连举办了4场“入校助跑”讲座。主讲讲座的“助跑员”都是校领导,华东交通大学党委书记王明主讲了其中一场,“在讲座中,学习、生活、情感各方面的问题我都跟学生聊。”王明说。

华东交通大学在心理健康教育领域进行探索和创新也获得了用人单位的首肯。“每年华东交大都要输送大量的毕业生进入铁路交通系统。有铁路部门的领导对我们说,非常欢迎我们的学生。因为铁路交通等项目的工作岗位要求长期在没有业余文化生活的野外偏远地方作业,具备良好心理素质的毕业生更有竞争力。”

今年3月,江西省文明办将江西省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辅导中心“落户”华东交通大学。对一所没有心理学学科的理工类院校,这大概算是一种“特别”的认可。



为配合国家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国儿童营养健康教育项目——雀巢健康儿童全球计划”首次走进湖北,在项目学校恩施市屯堡乡中心小学与近900名师生传播分享儿童营养健康知识。12月20日上午,《健康校园》农村分册主编、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胡小琪给屯堡中心小学四年级(1)班同学讲授营养健康知识。 本报记者 谢湘报

中国科大两位新晋院士:最看重的“身份”是老师

本报记者 王磊
通讯员 曾皓 刘爱华

近日,中国科学院、工程院先后公布2013年两院院士增选结果,中国科技大学赵政国教授、谢毅教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这两位新晋院士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老师“身份”看得最重。

谢毅是教育部化学领域第一位女性长江特聘教授,迄今为宁国家基金委化学部唯一一位女性创新群体带头人,也是首位获得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化学化工杰出女性奖的华人科学家。

当很多教授忙于争取研究经费和从事科研实验,分散了对课堂的关注时,谢毅却始终坚持教学与科研相长。因为在她看来,“作为教师,在备课的过程中需要更新许多知识,在讲课的过程中可以把自己的思路整理得更加清晰,在给学生的解惑过程中常常能获得新的灵感。”

因此,尽管科研任务繁重,谢毅仍然会每个学期都给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固体化学》课。

“每天早晨7点,谢老师就来办公室工作了。她思维活跃,对科研的敏感度高,随时有新想法随时找学生来讨论,气氛自由而热烈。”谢毅的学生、基金委首批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吴长征任教授说,导师这种与学生相处的方式,如今也成了自己与

学生相处的准则。

2008年,赵政国放弃了在密歇根大学的教职,与夫人卖掉了在美国的别墅,全职回归母校。作为首批“千人计划”入选者,他成为中国科大的一名教授,领衔该校实验高能物理团队。

初回中国科大时,赵政国对学院提供的办公用房进行了全面改造。为了给学生创造更好的交流讨论的条件,他把其中一间宽敞又阳光充足的办公室改造成了会议室,并添置了咖啡机、饮水机和投影仪。

现在,每周二是赵政国和学生铁打的“聚餐日”,过去,赵政国会和学生去食堂,边吃边聊,由于气氛过于热烈,担心在公共场所会打扰别人,后来他们将聚餐地点放在了改造好的会议室。

赵政国对学生很“细腻”。对招进来的每个学生,他都会仔细观察一段时间,并且与学生悉心交流,然后根据学生的兴趣和特长进行分类培养。“对科研有兴趣的学生,我会引导他怎样做好科研,而对科研没有兴趣的学生,我会为他设计一条适合他发展的职业之路”。

黄光顺是赵政国当年在中科院高能所指导的博士生。有件事情一直让黄光顺感触很深:赵政国坚持让学生直呼其名,而不是称老师。他坦言,“虽然当时觉得很习惯,但这的确建立了我们之间半师半友的关系,对工作中的平等讨论很有帮助。”

本版编辑/滕兴才

Tel: 010-64098256

法治·社会

E-mail: fzhsh2000@126.com

核心调查

本报记者 丁先明

快一年了,青岛市民孙凯感觉心中就像天天压着一块石头一样。

3年前,他放出一笔1000万元的短期贷款,随后手中攥着一处房产作抵押。然而,借款人私下串通房管部门工作人员,一分钱没还就成功注销了抵押。债权人孙凯被蒙在鼓里,对此一无所知。现在,借款人不知所踪,房产抵押权也被注销,孙凯的千万巨债面临“打水漂”的危险。

孙凯的遭遇暴露出民间借贷“青岛模式”面临的问题。这一模式曾经一度繁荣,其操作方式大致为:民间借贷公司作为中介平台,将有投资需求的放款人和有借款需求的借款人撮合在一起,借款人以房产作抵押,经青岛市房地产交易中心审核确认后,放款人获得房产抵押权并发放贷款,从而有效配置了民间资本。

“在‘青岛模式’中,房管部门本应是经济秩序的守护者,保障民间借贷的资金安全。我也是出于对政府部门的信任,才敢借出巨款。现在,因政府部门的失误,让我遭受了损失。”孙凯说。

千万元借款

据孙凯介绍,2010年11月,经青岛中德投资管理公司牵线,一个名叫李洪的生意人找到孙凯。李洪自称与朋友施君平合作开办一家体检中心,手头资金不够,想从孙凯处借钱。

经多次协商,2010年11月15日,孙凯与李洪、施君平签订一份抵押借款合同:孙凯向李洪放贷1000万元,施君平作为抵押人,将自己拥有完全产权的一处房产(权证字号:青房地权市字第20107274)作为借贷抵押,借贷期限为2010年11月16日至2011年1月15日,月利息约定为2%。

施君平用于抵押的房产位于青岛市市南区燕儿岛路22号,建筑面积为527.82平方米,现被用于开办一家中西医结合门诊部。经实地调查及参照市场现行价格,孙凯和施君平一致确认该处房产价值为1500万元。

这份抵押借款合同约定,如借款人不能正当履行还款义务,则放贷人有权根据法律规定的途径处分该抵押物,并就其变现价款优先受偿。

签订合同后的第二天,2010年11月16日,孙凯与李洪、施君平一起来到青岛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房地产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交易中心”)办理借款抵押登记手续。在获得交易中心办理的抵押房产他项权证后(青房地权市他字第201082033号)后,孙凯当天向李洪发放1000万元借款。

“我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多年,办事一向细心谨慎。放贷1000万元是个大事,虽然可能有风险,但我手上有房管部门颁

家贼难防 改革遭殃

民间借贷“青岛模式”因诈骗案搁浅

发的房产抵押权证,我觉得这是完全有保障的,万一有变故可以处置房产。”今年50岁的孙凯如是回忆当时的心态。

2011年1月15日,借款合同到期后,李洪以资金紧张为由,经孙凯同意,双方两次签订协议,将借款到期日延展至2012年3月15日,并将利息由月息2%提高至3%。2012年3月25日,二次展期合同到期,李洪仍然不能如期还款,并请求第三次展期,被孙凯拒绝。当年4月8日,李洪签订还款计划,保证2012年5月1日前还款1000万元,“到期换不了将抵押物变卖还款”。

然而,在一次次催促与等待中,孙凯始终未能收到还款。2012年8月25日,孙凯向青岛中院提起民事诉讼,将李洪、施君平以及贷款中介公司——青岛中德投资管理公司告上法庭,要求被告归还其1000万元借款本金及300万元借款利息。

2013年1月,在等待法院审理判决的过程中,因为突然联系不到李洪,孙凯决定按照合同约定,处理抵押房产以证明自己的经济利益。

对孙凯来说,房管部门的审核认定是他敢于对外借款的“定心丸”。“在催款过程中,虽然李洪多次不守信用,没有如期还款,但我始终认为自己有房管部门办理的房产抵押权证,政府部门难道还信不过吗?有房子在我手上,这是有保障的,也就没有太多担心。”

10分钟

然而,孙凯很快意识到自己的想法过于天真,一场骗局正在徐徐展开。

2013年1月21日,施君平突然告诉孙凯,称压根儿就不知道李洪借钱的事儿,自己也从未将房子抵押给孙凯。

孙凯大吃一惊,顿感事情蹊跷,立即到青岛市房地产交易中心查询。面对查询结果,他彻底傻眼了: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交易中心注销了孙凯的贷款抵押登记,他不再享有处分该处房产的任何权利。

中国青年报记者获取的这份抵押文件显示,2010年11月26日16时28分,也就是办理抵押登记和放款10天后,施君平、孙凯共同申请撤销抵押登记,撤销理由为“贷款已还清”。

“我根本就沒去交易中心办过任何抵押手续,文件上我的签名全是别人伪造的。他们撤销抵押时,我放款才10天,连一分钱都没收回,怎么可能‘贷款’还

清”?孙凯不明白,没有本人在场,交易中心怎么就能够办理撤押手续?

进一步查询的结果让孙凯更加震惊。就在他的房产抵押权证被注销10分钟后,青岛市房地产交易中心再次为施君平的此处房产办理借款抵押登记(房地产他项权证号:市201086757)。利用这次抵押登记,施君平向青岛华丰农村合作银行中韩支行借款1300万元,用于购买设备,借款期限为2010年11月26日至2012年11月25日。

“从撤押到再次抵押,中间只间隔了10分钟,这简直太不正常了。”孙凯说。

孙凯向青岛市房地产交易中心讨要说法,要求恢复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注销的房产抵押权证。交易中心答复称,“你的抵押权注销登记经办人为沈晓东,其未移交注销你抵押权登记的档案。现该经办人已被司法机关羁押,我中心已将上述问题反映给司法机关,待司法机关查清事实后,我中心将依法办理。”

2013年2月4日,交易中心进一步答复称,2012年12月18日,该处房屋被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在房屋被依法查封期间,暂不具备恢复抵押权的条件。

2013年2月21日,孙凯向青岛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请求撤销交易中心错误注销其房产抵押权证的行政行为,要求

恢复其房产抵押权证的合法权益。

2013年4月15日,“因本案情况复杂,不能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青岛市政府决定延期作出行政复议决定。5月6日,青岛市政府作出中止该行政复议的决定,理由是“因案件审查需要以申请人起诉的民事案件审查结果为依据,而该案件尚未审结”。

好制度的困境

正在孙凯维权无门之际,2013年8月14日,青岛中院对其1年前提起的追债民事诉讼作出判决:判令被告李洪、施君平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借款本金1000万元及利息300万元。

虽然赢了官司,但孙凯对讨回借款并不乐观。“施君平明知房产已抵押给我,又将房产再次抵押借款,已涉嫌骗取华丰银行贷款。交易中心为此报了案,他的房产也因华丰银行的申请,被法院查封了。我这一纸判决,根本无法执行。”孙凯说。

施君平在电话中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自己之前并不认识孙凯,也没有向他抵押过房产,这都是李洪设计的骗局。针对中院的判决,她目前已提起上诉。

在孙凯看来,事情败露后,施君平一直想“赖账”。他向记者出示了施君平和

他之间关于还款的来往短信,证明施君平在睁眼说瞎话。

孙凯现在唯一能做的,还是去交易中心讨说法,自己的合法权益之所以受侵害,就是因为交易中心管理混乱,致使工作人员利用职权违法注销了自己的抵押权,才导致了目前的局面,因此交易中心必须对此负责。

据了解,按照正常程序,注销登记抵押权必须各方当事人到场,经办人签字并提交申请材料后才能办理,而且经办人必须要移交注销档案,收回之前颁发的抵押权证,才能彻底完成注销程序。

“交易中心给我的回复说,注销登记经办人沈晓东未移交注销档案,那说明我的抵押权的注销程序尚未走完。在这种情况下,施君平又如何能够办理新的借款抵押登记?交易中心的管理是不是很混乱?”孙凯说。

事实上,在孙凯发现问题之前,包括沈晓东在内,交易中心已有5名工作人员被司法机关羁押审查。这5人收受贿赂,滥用职权,采取非法过户、重复抵押、非法撤押等手段,给至少50户房产受害人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交易中心法规信访处处长张译珍表示,目前此事已经刑事立案,由公安机关

介入调查,“按照先刑事后民事的原则”,只能等刑事案件审结完毕后,交易中心才能具体协商处理意见。

对于孙凯关于交易中心管理混乱的质疑,张译珍回应说,交易中心每天都要移交整理成百上千份档案,不可能一一梳理,同时,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一名工作人员即可办理产权抵押登记与注销业务。张译珍承认,因为缺乏另一方的审核把关,这种工作方式的存在漏洞,为个人违规操作留下了空间。“发现问题后,我们及时做了调整,现在已是两级审核。而且,房产档案必须当天移交,移交不完不能下班。”

然而,即使加强了管理,房产抵押登记仍然面临一些困境。交易中心一名业务副主任表示,现在证件、材料造假泛滥,会有个人拿假材料搞诈骗,而交易中心实在没有能力一一审查鉴别。

2011年5月17日,青岛市紧急叫停了城区房产抵押贷款业务,曾经热闹一时的“青岛模式”戛然而止。此前,这一模式曾被当作盘活民间资本、提升经济活力的一项创新之举,被广为推崇,不少地方纷纷赴青岛学习。

一个好的制度,因为执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走入“死胡同”,这未免有些可惜。“我们目前只是暂停执行,并不是说以后一定不做。”余副主任说。

然而何时重启,如何堵住制度执行中的漏洞,目前依然没有答案。

“这个制度本身没有问题,使得民间借贷活动得以规范化、阳光化运作,但在执行过程中,管理上的漏洞太多,个别工作人员违规操作,侵害了众多债权人的利益,最终毁了整个制度。”青岛一名从事民间借贷行业的人士告诉记者。

学者评出2013年度十大性与性别事件

“以暴制暴”妇女被判刑引争议,成为此次十大事件中关于性别暴力的典型案例。四川籍妇女李彦2010年为反抗长期遭受的家暴“杀夫”,后被判刑。媒体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13年初核准了死刑,100多名学者、律师和社会人士随即呼吁“刀下留人”。

活动评委、心理咨询师朱雪琴认为:“以暴制暴”源于受害者长期受暴、无力摆脱、孤立无援中,变得越来越被动和压抑,一些人在绝望中最终自杀或杀死施暴者。”朱雪琴举例说,许多国家将此类行为定性为“正当防卫”或“可原谅的防卫”,对家庭暴力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在中国,由于缺少对家庭暴力的专项立法和有效干预,国家和社会对此类悲剧应

承担更多责任。”她说。

联合国人口基金的中国“白丝带”公益活动咨询部部长王大为说:“一种性别对另一种性别的暴力,根本上说是性别歧视。”2013年,北京新巨人培训学校招聘启事上写“仅限男性”,女大学生曹菊将该校诉至法院,历经波折,双方于今年12月当庭和解。新巨人培训学校支付曹菊3万元用作反性别歧视专项资金,校长当庭道歉。这被称为“中国就业性别歧视第一案”。

2008年生效的《就业促进法》明确规定,就业歧视案件可以向法院起诉,但迄今尚无女性求职者因性别歧视而胜诉的案例。“曹菊维权道路之坎坷,彰显了中国社会性别不平等现状之严重,反映了我们的法律文化对‘歧视’的认识

缺失。法律应更加完善对就业性别歧视的定义与惩处。该案的和解结案,使司法失去了对性别就业歧视进行正式否定的机会。我们认为,对此类倡导性案件应避免‘和稀泥’式的模糊处理。”评委会乐说。

“我国现在缺乏对性别歧视的惩处机制。用人单位出现性别歧视的事件,并不能受到法律的惩处。”哈尔滨医科大学性健康研究与教育中心副主任彭涛说。

“性别暴力破坏着社会成员之间的健康关系,损害着社会的进步与和谐,我们应该对性别暴力零容忍。”方刚说。

自2013年5月“海南小学校长带6名女生开房”事件之后,反性侵成舆论焦点,防性侵教育更多地进入义务教育课堂。10月,四部委发布《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活动评委、中华女子学院性与性别研究中心副主任张静呼吁:“除了建立完善的制度保障外,也需要加强旨在提升青少年自我保护、自我决策能力的性教育。”